

## “两个伟大革命”视域下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学特征探究

王月洋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一战略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这一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解决党保持长期执政地位面临的难题提供了理论遵循,有助于进一步建构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学特征。

### 一、存在论维度:将人类解放作为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

政党的存在论旨在揭示其成为自身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特性,科学回答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什么”“为何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着宏大历史愿景与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伦理向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变革的客观机制,指向生产力层面的技术革命、生产关系层面的所有制革命、上层建筑层面的观念与制度革命等方面,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是一种被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

对历史矛盾运动的深刻把握,要求使命型政党具有高度历史自觉性,始终成为社会革命的推动者、引领者,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而存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使命型政党以自为的状态领导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坚持以唯物史观科学洞见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时代脉搏。因此,推进社会革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性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就明确表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引领推动社会从

旧质向新质的整体形态转换,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自觉与使命担当。

持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根本历史使命。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构建共产主义的分配正义原则:‘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自由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所面临的根本的必然性约束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一历史规律。无论是人的自由的实现或是获得,必然受到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束缚。推进社会革命,既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又要在解放生产力中构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制度,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分配正义原则。”

### 二、价值论维度: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立场

为了谁,依靠谁,以何者的利益为实践评判标准,以何者的发展需要为价值目标,这构成了政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阶级本质与存在方式决定了其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立场。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坚持群众史观是奠定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的英雄史观,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即“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

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人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正是处在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个人才是最真实的主体,是能动性具有普遍性的承担者。这彻底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确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在利益代表上对普遍性的彻底贯彻,构成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真实性来源。西方政党在社会利益代表及其意识形态建构上,存在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内在矛盾。西方政党类型学本质上也是基于西方特定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其构成类型上具有何种样态,始终不代表具有普遍性的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因此其意识形态具有以特殊主体指代普遍性的虚假建构性。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政权:“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类型学特征,必然以突破意识形态的虚假颠倒为基础,体现出真正的普遍代表性。

将人民情感与人民利益作为价值评判标准,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实践外化。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一方面,人民的朴素情感、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的根本发展需要,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政策的价值评判标准。另一方面,将认识论与群众史观相结合,是中国共产

党贯彻人民至上、制定正确策略路线的基础。正是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获得了鲜活的经验,经由党对于经验的总结升华,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再制定成正确的政策路线,贯彻到群众中去,形成新的斗争实践,最终使人民群众从自在发展为自为的阶级。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 三、方法论维度:在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政党为了达到其存在目标,实现其代表阶级的利益诉求,需要形成系统的、特定的思维与实践方法。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为了引领社会革命,实现党的初心使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自新时代以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并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以往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双向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从社会革命需要出发,要求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贯彻唯物论基础上的实事求是精神,从形势任务、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党的建设要求,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不断制定符合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诉求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从党员队伍自身变化等党内建设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明确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

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而且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是党坚持能动的反映论的深刻体现。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反映出“两个改造”的科学实践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两个改造”在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两个伟大革命”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改造客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理论要求,这要求使命型政党在实践中不断克服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矛盾,以高度能动性实现社会革命。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实践,统一党内思想,坚定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不断开展自我革命,改造主观世界。这种改造既包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现实,把握政党建设规律的真理尺度,亦包括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从而长期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质”的稳定,构建出政党功能的动态平衡性。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与民主监督“两个答案”进行有机统一,构建内外联动机制,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既坚持了群众史观,又深刻体现了内外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

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自我革命与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蕴含着对立统一、辩证否定、质量互变的唯物辩证法逻辑。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和政党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出发,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坚持系统观念。党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以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从而长期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质”的稳定,构建出政党功能的动态平衡性。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与民主监督“两个答案”进行有机统一,构建内外联动机制,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既坚持了群众史观,又深刻体现了内外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计划科学研究项目“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青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结构性转变及其当代启示”(项目编号:2025-KY-008)。(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与重塑研究

窦梓涵

### 二、破局之径:农民主体性的多维重塑路径

#### (一)以制度赋能推动主体激活

制度环境是塑造主体行为的关键性因素。推动农民主体性从“沉睡”到“激活”,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为农民提供稳定、畅通的参与渠道和权利保障。首先,深化治理赋权,保障政治参与空间。必须超越形式化的村民自治,通过落实“一事一议”制度,推广“参与式乡村规划”,确保农民在村庄重大事务,如项目选址、资金使用、产业规划中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这要求基层政府转变替民做主的惯性思维,构建由民做主的协商治理机制;其次,强化组织赋能,提升集体行动能力。积极扶持与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载体发展,通过组织的平台,将分散的农户凝聚起来,使其能够有效对接市场、承接资源,从而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最后,完善法治保障,筑牢权利底线。需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完善乡村法律服务体系,让农民在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利益分配等环节清晰知晓并有力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为其主体性表达提供坚实的法律后盾。

#### (二)以经济赋利催化主体重塑

其一,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必须摒弃将农民排除在价值链核心环节之外的模式。应大力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当农民能够清晰地预见并实际分享到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时,其参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被真正、持久地激发。其二,拓宽资产增值渠道,推动“资源变资产”。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农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沉睡”资产,通过自营、出租、入股等方式,使其成为农民可以掌控并带来持续收入的资本。这一过程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更在深层次上强化了其作为集体资产主人的主体认同感。其三,赋能数字技能,拥抱新经济形态。开展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

数字技能培训,帮助农民跨越“数字鸿沟”,直接对接广阔市场,从传统的生产者转变为“新农人”和创业者,在数字经济浪潮中重塑其主体性。

#### (三)以文化赋信筑牢主体认同

一方面,复兴乡土文化,重塑价值自信。深入挖掘并活化利用乡村独有的历史文化、民俗技艺、农耕文明等资源,支持农民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角。通过举办民俗节、建设村史馆、发展文旅融合产业,让农民在重温乡土文脉、见证文化价值的过程中,重拾对自身和乡村的文化自信,认识到“乡土”并非落后的代名词,而是发展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培育公共精神,再造社区认同。针对乡村“原子化”趋势,通过设立乡风文明红黑榜、组建志愿服务队、评选道德模范等形式,积极培育邻里互助、守信重诺、爱护环境的公共精神。这种基于文化的柔性约束与激励,能够有效激发农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其从被动卷入到主动融入的主体性升华。

#### 三、结语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人的振兴。农民主体性的“激活”与“重塑”,是一个从外部赋能到内生自觉的辩证发展过程,它要求我们超越将农民视为被动客体的传统治理惯性。制度为农民参与提供舞台,经济为其行动注入动力,文化则为其认同提供根基。未来的乡村振兴实践,唯有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精准把握“激活+重塑”的内在逻辑,方能在广袤的乡土大地上,真正培育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发展动力,谱写出一曲曲“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篇章。

基金项目:2024年自治区级广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吹响‘村字号’——群众性文体活动助力农民主体性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探究——以玉林的村BA等活动为例”(项目编号:S202410602045)。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大学生文化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

杨非 马文文

###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高校大学生,采用方便抽样法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057份。性别分布方面,女性占比56.5%,略高于男性的43.5%。年级分布方面,样本主要由低年级学生构成,大一学生占61.5%,大二、大三学生合占38.5%。户籍地分布方面,样本中农村生源占主导地位,有77.1%的学生来自农村。

#### (二)研究资料收集

研究采用结构化问卷,包含两大模块:一是人口统计学基础信息与家庭文化资本变量;二是文化素养多维度评估量表,包括自我效能感知、认知体系构建、复合影响因素、多元形塑机制,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施测。信度检验显示,各量表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0.877;效度检验中,各量表KMO值均大于0.9且显著性<0.05,表明问卷信效度良好。

#### (三)数据处理

运用SPSS 29.0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处理。

### 二、研究发现

#### (一)基本情况

1.主流价值认同度较高,精神传承基础扎实。大学生对文化素养重要性的认知均值为4.04(SD=0.900),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基本内容的了解度均值为4.09(SD=0.922)。对长征精神、雷锋精神等的认同与践行度均值分别为4.04(SD=0.908)和4.10(SD=0.900),各项均值接近量表高分值且数据分布有较高集中性,显示对主流价值与革命精神的高度认同与传承意愿,奠定了坚实的文化素养思想基础。

2.多元文化认知覆盖面较广,核心内容掌握牢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了解度均值分别为3.86(SD=0.855)、3.81(SD=0.874)、3.78(SD=0.879)。对红船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的认知均值分别为3.71(SD=0.974)、3.83(SD=0.923)。各项指标均超过量表中值上限且数据离散程度适中,表明文化认知体系全面且核心内容掌握牢固。

3.新媒体文化参与度较高,传播载体适配性良好。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短视频偏好、文化类网红关注度、相关公众号关注度的均值分别为3.85(SD=0.923)、3.90(SD=0.970)、3.82(SD=0.941)。数据显示,三项指标均值均处于量表中高分段且数据分布有较高集中性,表明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接触文化的重要途径,其形式与大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适配性高,拓展了文化素养培育路径。

4.教育环境认可度较高,支持体系评价积极。大学生对学校教育、社会环境、家庭重视度的评价均值分别为3.91(SD=0.842)、3.82(SD=0.902)、3.89(SD=0.873);思政课参与度均值3.89(SD=0.906)、家庭传统文化讨论均值3.68(SD=0.993),主旋律作品关注度均值3.63(SD=0.954)。数据显示,支持体系评价指标与行为参与指标的均值均超过量表中值上限,标准差数

值显示离散程度适中,表明家庭、学校、社会构成的支撑体系获得普遍认可。

####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理论教学吸引力有限,教育方法待优化。大学生对理论课提升路径的认同度均值3.80(SD=0.884)显著低于实践活动认同度均值3.94(SD=0.870)。尽管思政课参与度均值达3.89(SD=0.906),但理论传授与学生需求的适配性不足可能影响转化效率。数据差异表明,部分理论教学仍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与现实脱节等问题,导致知识吸收效果不佳。

2.文化实践参与浅层化,系统性不足。虽然大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的行为均值达3.91(SD=0.905),但结合经典阅读不足与理论学习深度欠缺的情况,导致文化体验易陷入浅层化。实践与认知的脱节导致文化体验缺乏系统性,难以形成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的完整链条。

3.媒介使用偏向娱乐化,素养培育待加强。大学生对短视频的偏好均值为3.85(SD=0.923),显著高于经典阅读均值3.50(SD=0.982)。大学生虽能通过新媒体接触文化,但对信息的甄别与深度利用能力不足。媒介使用的娱乐化倾向导致大学生文化认知碎片化,从数据看,“了解文化素养内涵”的均值为3.63(SD=0.925),低于媒介接触频率,反映出认知深度滞后于接触广度。提示媒介素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需进一步强化。

#### 三、思考与建议

(一)改进理论教育方法。认知逻辑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设计从抽象到具体的问题链教学,推动理论认知向实践转化。教学范式维度,创建具身化学习场景,借助短视频等技术手段,促进情感体验、思维进阶与行为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价值内化维度,通过历史叙事与情境模拟,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中触发价值反思,促进真理力量向自主实践转化。

(二)设计文化实践认知链条。低年级侧重文化认知启蒙,通过红色剧目排演等浸润项目实现感性认知向理性认知的转化。中年级聚焦实践能力结构化培养,借助非遗技艺工作坊等项目强化文化责任感。高年级注重创新成果产出,通过文化IP孵化平台支持文创开发与自媒体运营,形成知行合一的价值创造能力。

(三)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内容甄别能力,围绕信息验证、逻辑推理等维度开发进阶训练,系统培养批判性思维。提升信息生产能力,通过系统训练掌握选题策划到传播优化的全流程技能,切实提升数字化表达水平。优化舆情应对能力,模拟典型情境,通过角色扮演培育危机研判与理性对话能力。

基金项目:2024年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短视频助推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项目编号:XJK24BDJ005)。(作者单位: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党二十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置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位置,并鲜明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一系列战略部署,其成效的根基在于“人”,即亿万农民的主体性能否被有效激发。然而在当前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干部干、群众看”“政府热、农民冷”等主体性虚置现象仍普遍存在,构成了政策预期与实践效果之间的显著张力。鉴于此,本文旨在构建“激活+重塑”的多元分析框架,探求农民主体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多维实践路径,为破解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难题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 一、理论之基:“激活+重塑”的多元分析框架

“激活”是一个外源性、启动性的过程。它指向通过外部制度、资源和环境的系统性干预,打破农民主体性被压抑的休眠状态。其核心机制在于赋能与赋权。赋能即通过能力建设、资源注入,提升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能性;赋权则是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农民在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这一过程旨在为农民主体性的萌发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解决能否参与的问题。

“重塑”则是一个内生性、生成性的过程。它是指在“激活”的基础上,农民内在的精神世界、价值认同与行动逻辑发生深刻转变,从被动的政策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谋划者、建设者和分享者。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主体意识与能力的内部建构,最终实现农民在身份认同上从“我为乡村发展”到“我的乡村我发展”的根本性转变,解决是否愿意并能够持续参与的问题。

二者构成一个连续的辩证统一体:激活是重塑的前提与催化剂,为内生动力提供生长的土壤;重塑是激活的旨归与归宿,做好外部干预与思想引领。新时代激活发展动力。任何成功的乡村振兴实践必然是这两个过程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的结果。

## 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的实践指向

李振英 周韦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国家进一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如今乡村振兴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中成效初步显现,宣传工作在塑造乡村形象、凝聚振兴力量、提高农村知名度和美誉度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创新发展的具体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一、以“正”引领,把准主流“方向盘”

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方向应该是弘扬主旋律,宣传积极向上精神风貌。首先,农村宣传工作要做好政策宣讲和普及工作。农村宣传工作者作为农村形象的“喉舌”,必须要明确自身工作的使命和任务,知道自己是为“谁发声”、处理好“如何发声”的问题。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是为党为国为社会主义发声,要把握宣传导向,做好正面引导和思想引领。新时代宣传工作虽然在宣传内容上会有新变化,但是仍然要坚持“底色”不变、方向不变,依然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做好新时代党和政府政策方针和实际工作方向的“传声筒”,把农民凝聚在党的周围。其次,要重点宣传农村榜样人物和文明家庭。比如,宣传创业先锋、孝亲子女、道德标兵、“五星”家庭、卫生家庭、勤劳致富家庭的感人事迹,榜样宣传不仅是农村风气引领的重要载体,也是凝聚价值共识的载体之一。通过榜样人物和文明家庭宣传向内引导村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友好勤奋传播正能量的时代新农人,向外展示农村农民发展新面貌。另外,宣传好村内外大事务。宣传工作是公开村务的有效路径,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要立足农村,利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介将农村基本公共事务传达到家户户,使农民知晓村内基本情况,培养村民主人翁意识。

#### 二、以“多”聚力,壮大宣传队伍

在人人自媒体的时代,农村宣传工作不仅要扩大官方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也要借助非官方媒体的

力量。官方媒体主要是指能够代表政府或者基层村委的媒体,目前政府官方媒体对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的宣传比较全面,但是较少基层村委有专门的官方媒体宣传号,做好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需要基层村委掌握宣传主动权,建立乡村建设官方宣传账号。官方宣传号主要用于发布通知、澄清事实、榜样宣传、日常建设、文化引领和民意征集等,既增强了本村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打开了其他人了解该村

的窗口,提升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应注重非官方媒体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比如,村民、非遗传承人、创业青年、生活博主的自媒体。非基层村委官方媒体往往内容更贴近村民生活实际,表达形式贴近民生,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要将两种媒体进行结合,多主体参与农村宣传工作,在增强基层村委官方媒体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同时团结各类自媒体,引导非官方媒体自觉宣传正能量,展现乡村振兴新变化、新成就,提升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的覆盖面。

#### 三、以“新”赋能,拓展宣传形式和手段

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要创新宣传载体和方式,善于运用网络新媒体,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宣传空间。一方面要注意网络媒体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对热点事件“溯本查源”,及时向社会传递真实信息,避免或缩小负面和不实舆论的影响。新时代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和辐射范围远超想象,把控好互联网阵地就是守住了农村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所以农村宣传工作要兼顾舆情控制,对消极、不实或动摇人心的舆情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农村网络宣传可以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根据农民所处环境和接受能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宣传,提高宣传工作的时效性。另一方面既要开辟农村宣传网络阵地,也要守好传统宣传阵地。要继续坚持以农村宣传工作的新方法,比如,善于运用黑板报、宣传栏、广播、大字横幅等。守好传统优良宣传方式是农村发展人文关怀的体现。尽管网络日新月异,但是农村仍有一部分老年群体

在互联网面前处于弱势地位,了解国家政策和获取外界信息主要依赖传统方式,所以用好网络新媒体和守好传统宣传方式同等重要。

#### 四、以“实”铸魂,讲好“三农”故事

“宣传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取决于政府和基层干部是否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福利,事实永远胜于雄辩,千言万语不如一件为农民服务的实事,所以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一定要以事实为基础,重点宣传党和政府解决百姓“牵肠挂肚”的难事,给百姓“雪中送炭”的“暖事”,落脚在党和政府为惠民生所做的具体事情上,这样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愿意信。农村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必须聚焦农业、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将“春耕秋收”的故事写在农村土地里,讲好农作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生长过程,用种子自然生长诠释生命意义和农业发展历程,用无数“种子”的故事宣传“三农”精神,让农民从中感受到播种的精神力量,让孩子感受生命、感受自然。宣传农村建设要深入考察农村历史,走进农户家中,倾听农民讲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带来生活品质提升的事例,做到宣传农村就从农村建设入手。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最根本的是对农民生活现状的记录,要走进农民群体之中,用文字、语言、镜头和画面反映农村、创业、传承和育人的动人故事,宣传好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农民的新追求、新气象。

新时代农村宣传工作要在“正”“多”“新”“实”四个方面下好功夫,坚持正确宣传导向,团结农村宣传主体,丰富农村宣传工作形式和方法,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农村宣传工作定能焕发新的光彩,展现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农村新面貌。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边疆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多元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2YJC710098)。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